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13

郭璞

连镇标 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学术顾问

季羨林

钟敬文

启功

程千帆

丛书策划

侯忠义

杨爱群

特邀编审
(按姓氏笔画)

宋加哲

张俊

张国星

林辰

侯忠义

欧阳健

高翔

董文成

傅憎享

薛勤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(1)

郭璞

连锁标著
•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郭璞/连锁标著. -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1999. 1

(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)

ISBN 7-5313-1968-3

I. 郭… II. 连… III. ①古体诗—文学评论—中国—魏晋南北朝时代②郭璞(276~324)—文学评论 IV. 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4728 号

郭 璞

连锁标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56 千字 印张: 3 1/4 插页: 2

印数: 1—8,000 册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杨爱群

责任校对: 李守勤

于维良
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王 颖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ISBN 7-5313-1968-3/I·1706

本册定价: 6.00 元 总定价 (全 100 册): 600.00 元



连镇标 福建仙游人，1949年生。1987年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毕业，获文学硕士学位。1997年苏州大学文学院毕业，获文学博士学位。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。已在《世界宗教研究》、《周易研究》等杂志发表的论文有：《〈易林〉神仙思想考》、《〈太平经〉易学思想考》、《焦延寿易学渊源考》、《福建官刻考》、《论闽刻本的价值》等；已发表的著作有：《易学与道教文化》（合著）、《历代游仙诗文赏析》、《史家名言妙语》等。

目 录

- 一、坎壈一生 壮心不已 / 1
- 二、景纯仙篇 挺拔而为俊 / 14
- 三、弘农辞赋 中兴之冠 / 65
- 四、道德文章 泽被后世 / 96

一、坎壈一生 壯心不已

郭璞，字景纯，河东闻喜（今山西闻喜县）人。生于公元276年，即晋武帝司马炎咸宁二年；卒于公元324年，即晋明帝司马绍太宁二年，享年四十九岁。郭璞出身非豪门望族。其父郭瑗，晋初任尚书都令史（据段熙仲考证，令史有如后代的书吏，供写书。都令史在宋代官不过七品，位在郎下，禄不及四百石。据此，郭瑗的出身可以说是贱客），终官建平（今属四川省）太守。郭璞青少年时代，大抵上没有离开家乡闻喜。其时社会环境表面安定，郭璞的家庭生活条件随着郭瑗官职的升迁逐步获得改善，这就为郭璞的潜心治学提供了良好的机会。史称，“璞好经术，博学有高才，而讷于言论，词赋为中兴之冠。好古文奇字，妙于阴阳算历”（房玄龄《晋书》卷七十二《郭璞传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一八九九页）。据说，其时有个叫“郭公”的人，客居河东，精于卜筮，郭璞跟他学习。郭公授以《青囊中书》九卷，郭璞因此擅长五行、天文、卜筮之术，“攘灾转祸，通致无房，虽京房、管辂不能过也”（同上）。

晋惠帝、怀帝之际，河东一带发生骚乱。匈奴

左贤王刘渊于晋惠帝永兴元年(304)在离石(在今山西省)起兵反晋,自称大单于,又称汉王。晋怀帝永嘉元年(307),进据河东,攻陷蒲坂(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)、平阳(今山西临汾),入都蒲子(治所在今山西隰县)。永嘉二年(308),迁都平阳,僭即皇帝位,国号汉。闻喜离刘渊的大本营平阳不远,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郭璞不能不感受到战争的威胁。他预知“黔黎将湮于异类,桑梓其翦为龙荒”(同上),但作为寒门细户,他无力回天。郭璞在政治上既没有唤起民众抵御异族入侵的号召力,在经济上也没有力量招兵买马筑堡自卫,为保全身家计,他只得“潜结姻昵及交游数十家”避地东南。

郭璞离开家乡闻喜,取道猗氏(治所在今山西猗氏南二十里),越南山(即中条山)之高岭,抄焦丘(又作焦邱,在今山西省)之径道,经解池(即盐池,在今山西运城县境内)、河北(在今山西芮城县),渡黄河,过陕城(今河南三门峡市),陟函谷(即函谷关,在今河南灵宝县南),东抵洛阳。在洛阳盘桓期间,写下《流寓赋》,真实地记录了自己从老家闻喜逃难到洛阳的沿途见闻,抒发了自己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。尔后,郭璞又向东南进发,到达庐江(在今安徽省)。当时江淮一带表面上“清宴”,庐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为军咨祭酒,安于现状,无心南渡。郭璞借卜筮警告胡孟康,兵燹在即,坐守必败。胡孟康不之信,郭璞只得促装而去。后数旬,庐江果陷敌手。

郭璞南渡长江，直抵宣城（在今安徽省），宣城太守殷祐引为自己的参军。不久，郭璞离开宣城东下。当时晋元帝司马睿尚以琅玕王的身份镇守建邺（今南京），任丹阳太守的王导颇为赏识郭璞的才华，让他参己军事。洛阳、长安相继失陷，晋怀帝司马炽、晋愍帝司马邺先后被匈奴刘曜所俘，神州半壁河山落入异族之手，西晋终于灭亡。司马睿于建武元年（317）在建康（今南京市）自立为晋王，翌年称帝，是为晋元帝。对中原的沦陷，郭璞痛心疾首，悲愤万分，在《答贾九州愁诗》中写道：“顾瞻中宇，一朝分崩。天网既紊，浮颢横腾。运首北眷，邈哉华恒……乱离方歟，忧虞匪歇”；对东晋新王朝，郭璞寄以收复失土、振兴晋室的厚望，在《与王使君诗》中希望王导佐助晋元帝完成统一大业，并积极为之出谋划策：“怀远以文，济难以略。光宝岳漠，折冲帷幕。凋华振彩，坠景增灼。穆其德风，休声有邇。方恢神邑，天衢再廓。”他不遗余力为东晋新王朝唱颂歌。先是著《江赋》，述长江之美，“其辞甚伟，为世所称”（房玄龄《晋书》卷七十二《郭璞传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一九〇一页），极大地激发了群臣庶民戮力晋室的爱国主义热忱；后复作《南郊赋》，盛赞东晋王朝的开国大典，为司马睿登台涂脂抹粉，晋元帝“见而嘉之”，任命他为著作佐郎（数年后又擢升为尚书郎）。但东晋王朝并无一点革新气象，统治者步前朝之后尘，以酷刑重法镇压人民，加上太兴初年江南灾荒频

仍，而朝廷却赋敛不已，百姓困苦不堪。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，郭璞利用各种可能利用的机会，多次上疏晋元帝，请求省刑减赋，实行大赦，驱逐奸人，以正视听。《晋书》本传称他“数言便宜，多所匡益”。这一切无不表现了郭璞参政议政的积极性。

郭璞晚年遭母丧去职，择葬地于暨阳（在今江苏江阴东），把他母亲和哥哥的尸骨安葬在那里。他服孝未满周年，便被盘踞荆州的王敦起用为记室参军。王敦是个极端残忍、凶狠的军阀、野心家，对朝廷夙有二心，郭璞对此早有所觉察，只是慑于其权势，不得不在其幕府供职。但他仍心系晋室，处心积虑为司马氏集团效劳，所以当新即位的晋明帝司马绍派人征求他的政见时，郭璞即上疏请求改年肆赦（改年号，藉以向世人表明司马氏政权的延续、强大，非王氏豪门所能动摇；肆赦，旨在笼络人心，巩固东晋新王朝）。而当王敦反叛阴谋豁露时，朝廷重臣温峤、庾亮欲讨王敦，让郭璞占他们二人的吉凶，郭璞说“大吉”，以神明的力量鼓励他们的举动，坚定其必胜的信心，促使朝廷作出讨伐王敦的决策（年轻的晋明帝司马绍正是在温、庾二人的力劝下，才下决心讨伐王敦的）。与此相反，当王敦欲把反叛阴谋付诸行动时，亦叫郭璞占筮，郭璞却说“无成”，假天意予以阻止。王敦本来就怀疑郭璞暗地里鼓动温峤、庾亮讨伐自己，又闻卦凶，大为不悦，乃让郭璞卜寿命。郭璞不假思索答道：“思

向卦，明公起事，必祸不久。若住武昌，寿不可测。”（是说，根据刚才占卦的结果看，您要起事的话，不久必遭祸殃死去；倘若退驻武昌的话，您的寿命长得很）其旨在敦促王敦撤军返巢，远离建康，以解除对东晋首都的威胁。王敦大怒，反唇相讥：“卿寿几何？”郭璞知道王敦决心要杀他，便毫不畏惧地答道：“命尽今日日中。”王敦怒不可遏，当即收捕郭璞，诣南冈斩之。平息王敦之乱后，朝廷追赠郭璞为弘农太守。

有人认为，郭璞是在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牺牲，成为晋室的忠臣（或曰：郭璞是处在政治矛盾的夹缝里，像嵇康等人一样作了时代的牺牲），不能如与他齐名的刘越石（刘琨），留在敌后，力图恢复，为民族的自由而死，是可以惋惜的。笔者不同意此种看法。诚然，郭璞是在司马氏政权与豪门王氏的斗争中献出自己的生命，其动机是为了维护东晋王朝的利益，但客观上也是维护江左半壁河山的完整，有了江左作根据地，才有可能收复失土，完成统一大业。如果东晋王朝内乱不已，势必给外族野心家南侵提供了机会，这不啻是永嘉之乱后的又一场民族灾难。故郭璞此举（指郭璞通过占卜活动，促使温峤、庾亮讨伐王敦，竭力阻挠王敦反叛，乃至杀身成仁）于国于民是有贡献的，我们不能仅以“晋室忠臣”目之。他与刘琨，一南一北，一文一武，都是为捍卫民族利益、维护国家统一而死，我们不能厚此薄彼。当然，其死的价值亦不能与嵇

康等量齐观。

纵观郭璞一生，才高命舛，四海飘泊，仕途偃蹇，终其身不过是王敦幕府中的一名记室参军。何以如此？《晋书》作者认为这是郭璞自身的原因：“性轻易，不修威仪，嗜酒好色，时或过度。著作郎干宝常诫之曰：‘此非适性之道也。’璞曰：‘吾所受有本限，用之恒恐不得尽，卿乃忧酒色之为患乎！’”（房玄龄《晋书》卷七十二《郭璞传》，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页）从占到今都有人持这种看法。但笔者以为，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郭璞的行为有失检点。众所周知，魏末两晋社会玄风大炽，所谓名士文人，大都反对儒家的传统道德和礼教，一味追求任诞旷放的生活。东晋道士葛洪对此作了生动而真实的叙述：“（名士）蓬发乱鬓，横挟不带，或褻衣以接人，或裸袒而箕踞。朋友之集，类味之游，莫切切进德，闾閻修业，改过弼违，讲道精义。其相见也，不复叙离阔，问安否，宾则人门而呼奴，主则望客而唤狗。其或不尔，不成亲至而弃之，不与为党。及好会则狐蹲牛饮，争食竞割，掣拔森撻，无复廉耻，以同此者为泰，以不尔者为劣。终日无及义之言，彻夜无箴规之益。诋引老庄，贵于率任。大行不顾细礼，至人不拘检括。嘯傲纵逸谓之体道。”（《抱朴子》外篇《疾谬》卷第二十五，上海书店1986年版《诸子集成》第八册第一四九至一五〇页）即使在达官贵人中，亦不乏此种人。其放荡狂妄的程度与郭璞相比，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但

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仕途。如，号称“八达”的谢鲲、胡毋辅之、阮放、毕卓、羊曼、桓彝、阮孚、光逸，其日常行径无异于禽兽（《晋书·光逸传》载：“（光逸）初至，属（胡毋）辅之与谢鲲、阮放、毕卓、羊曼、桓彝、阮孚散发裸袒，闭室酣饮已累日。逸将排户入，守者不听，逸便于户外脱衣，露头于狗窦中，窥之而大叫。辅之惊曰：‘他人决不能尔，必我孟祖也。’遽呼入，遂与饮，不舍昼夜，时人谓之八达”），但他们多为东晋王朝所器重，封侯赐爵者大有人在；周顗的私生活放荡、下作，令人恶心（《世说新语·任诞篇》载：有人讥周仆射（周顗）“与亲友言戏，秽杂无检节”，周曰：“吾若万里长江，何能不千里一曲？”刘孝标注引邓粲《晋纪》曰：“王导与周顗及朝士谐尚书纪瞻观伎。瞻有爱妾，能为新声。顗于众中欲通其妾，露其丑秽，顗无忤色。有司奏免顗官，诏特原之”），但仍贵为尚书左仆射。这就足以证明，行为放浪不羁，乃晋代上层社会的风尚，它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纵容和默许。因而《晋书》本传称郭璞的“性轻易，不修威仪，嗜酒好色”，也决非是其仕途偃蹇的根本原因。其根本原因乃是晋代的门阀制度在作祟。两晋社会承袭了曹魏九品官人法，取士用人，重门阀，重出身，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，“世胄躐高位，英俊沉下僚”，在政治、经济以至文化方面确保了高级士族世代不易之特权。贫寒出身的人在政治上根本没有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，寒门与世族之间永远存在着一条森严的阶级鸿沟，两晋历代统治者谁都不想去填平它。这就注

定了郭璞一辈子不可能获得高官要职。更何况东晋王朝是草创于江左的新政权,皇室力量远不能与西晋相比,而门阀势力却更强大,对皇权的威胁也更明显。为了维系脆弱的江左小王朝,东晋皇帝必须依赖南下的北方大士族以及土著的南方大士族的支持,必须让这些高级士族分享政权。故郭璞虽千里迢迢来投靠东晋新王朝,但因他不属于南渡的北方大士族之列,仍不得司马睿、司马绍父子的重用。最能说明这问题的一件事,是晋明帝司马绍在东宫时(即做太子时),与温峤、庾亮并有布衣之好,郭璞亦以才学见重,埒于温、庾,成为士林一段佳话。可是司马绍当上皇帝后,温、庾二人都被擢升,先后执掌朝政,而郭璞却被冷落一旁,屈居下僚。其因就是温、庾乃南渡的北方豪门望族。

此外,郭璞之所以终其生无法跻身于重臣之列,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在统治者眼中,他乃一介方术之士,属社会末流,不能登高堂殿宇。郭璞“妙于阴阳算历”,在治学门径上承袭了汉儒董仲舒的阴阳灾异学说,祖尚京房《易》象数学,兼综方术,精于卜筮,成为集儒术与方术于一身之大家。但其社会地位却远不如其先师鼻祖。在汉代,董仲舒为今文经学大师、一代大儒,汉武帝奉若神明;京房因占术精湛,曾一度博得汉元帝的宠幸,出入宫廷,品评权贵,踌躇满志,世人亦竞相学习京氏象数学。但自魏始,由于失去统治阶级的支

持，儒学呈现着极度衰微无力的状态。儒家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。作为从儒林衍生出来的方士，更为世人所不屑（曹操还曾一度把各地的方士术者拘禁在京都，以防其作乱）。而郭璞立身行事，往往以方士面目出现。“璞消灾转福，扶厄择胜，时人咸言京（房）、管（辂）不及”（《世说新语·术解篇》刘孝标注引王隐《晋书》，《诸子集成》第八册《世说新语》卷五第一八四页，上海书店1986年版），这与世人心目中的儒家形象大相径庭。如此之人，即使对于打着尊儒旗帜、企图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东晋统治者来说，亦失去了利用的价值。充其量只能让他当一名临事卜问吉凶的术者，而绝不能让他参与管理国家大事，否则有损朝廷声誉。故终其生不过是王敦府下的一名幕僚。这跟汉武帝把大学问家东方朔视为插科打诨、消愁解闷的俳优，何其相似乃尔！

郭璞的思想极为复杂，儒、道兼而有之，其行为与其流露在作品（主要是游仙诗和辞赋）中的思想往往“对立”，令后人困惑，因而对其思想的认识多失之偏颇。或以善卜精筮的方士术者轻之，或以颓废、避世的道家或道教徒视之，皆没有从整体上把握郭璞的思想本质。笔者则结合郭璞的行为与作品进行综合研究，认为郭璞儒道双修，对儒、道二家学说都有天然之爱好（尚无资料可证郭璞与佛理有关），且都信之笃，钻之深，付诸实践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但相较之下，郭璞思想主流仍应是儒家。其据有：

一是家庭环境的熏陶。郭璞出生后，其父郭瑗由尚书都令史而终官于建平太守，官至五品，禄为三千石。家庭的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，这就必然要求郭璞接受其时官方规定的儒家经典修养，同时郭瑗的敢于驳正上司，以公方著称，又显然是个典型的正直的儒家知识分子。《晋书》本传载：“（郭璞）父瑗，尚书都令史。时尚书杜预有所增损，瑗多驳正之，以公方著称。”（房玄龄《晋书》卷七十二《郭璞传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一八九九页）父辈的言传身教，对郭璞儒家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。

二是对儒家经典的爱好甚于道家著作。《晋书》本传称郭璞“好经术”，经术犹经学，谓其潜心研究儒家经典（儒家经典为“六经”，即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）。考其学术著作，儒家类多于道家类。儒家类有《毛诗拾遗》、《夏小正注》、《尔雅注》、《易洞林》、《新林》、《卜韵》等，而被《道藏》视为道家类著作只有《山海经注》、《穆天子传注》。

三是从郭璞给晋元帝、晋明帝的一系列奏疏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，“上念国政，下悲小己”，忧国忧民，盼望天下统一，始终是郭璞梦牵魂绕的主题。

四是郭璞的英勇就义是实践儒家杀身取仁之壮举。当王敦将要举兵叛乱时，郭璞冒险谏诤，慷慨捐身，集中体现了儒家重义轻生的节操和“威武

不能屈”的崇高气概。至于道家的高蹈遗世的主张和道士隐遁山林的逍遥生活，郭璞心向往之。尤其是在其仕途偃蹇时，他何尝不考虑激流勇退，散发裸足，栖息于深山幽壑呢？道教徒的服丹轻举，郭璞亦何曾不想尝试一番？儒、道两种思想始终在郭璞头脑中激烈斗争着，无法得到调和。思有为，却被门阀制度所阻；欲隐遁，又恐负平生志向。欲仕不能，欲隐不忍，使其痛苦万分，这亦是郭璞悲剧命运之所在（从某种角度上说，郭璞这种欲仕无门、欲隐不甘的状况，亦是封建社会里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境遇）。而郭璞的以身殉难，表明儒家舍生取义的思想最终占据主导地位。有人根据郭璞的诗文中流露出来的道家思想就判定他为纯粹的道家，因为郭璞平生好卜筮就目之为地道的方士术者，这种看法未免片面。诚然，在郭璞身上，道家思想和方士气息是很浓厚的。但如果是十足道家的话，当王敦即将叛逆时，他会像庄周、老莱子之妻避祸全身于山林，而绝不会冒死劝谏以至丢了脑袋；如果是道地的方士术者的话，势必凭藉其法术故弄玄虚，博取君主欢心，以求高官厚禄，如汉代栾大之流，而绝不会像他那样借占卜的结果去触权贵的霉头，做赔进性命的亏本生意。

郭璞一生勤于笔耕，著作颇丰。据《晋书》本传载：“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，名为《洞林》。又抄京、费诸家要最，更撰《新林》十篇、《卜韵》一篇。注释《尔雅》，别为《音义》、《图谱》。又注《三苍》、

《方言》、《穆天子传》、《山海经》及《楚辞》、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数十万言，皆传于世。所作诗、赋、诔、颂亦数万言。”（房玄龄《晋书》卷七十二《郭璞传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一九一〇页）郭璞的诗、赋、疏、诔、赞，迄南朝梁时殆已编辑成集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四著录：“《晋弘农太守郭璞集》十七卷，梁十卷，录一卷。”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郭璞集》皆为十卷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《郭璞集》为六卷，说明宋时它已有散佚。迄明代，《郭璞集》散失殆尽。明代以后，人们又开始搜集、编辑《郭璞集》。较常见的辑本有：《郭弘农集》二卷，明张溥辑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本；《郭弘农集》二卷，附录一卷，明张燮辑《七十二家集》本；《郭弘农集》，明叶绍泰辑《增定汉魏六朝别解》本；《郭景纯集》二卷，清姚莹、顾沅、潘锡恩辑《乾坤正气集》本。另外，清人严可均《全晋文》和丁福保《全晋诗》都分别辑录了郭璞的诗、文，今人逯钦立《先秦汉魏南北朝诗》辑录了郭璞诗三十首，较为完备。今人聂恩彦有《郭弘农集校注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。